

北宋

经学与文论

马兴祥 著



人民出版社

北宋

经学与文论

马兴祥 著



组稿编辑:孙兴民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刘 恒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经学与文论/马兴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01-009564-6

I. ①北… II. ①马…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宋代②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Z12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7888 号

北宋经学与文论

BEISONG JINGXUE YU WENLUN

马兴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4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564-6 定价:2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研究中国古代文论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的关系，要理论联系实际；二是文学思想与艺术观念在审美意识方面的精神联系，要将诗文理论与乐论、书论和画论加以融会贯通；三是特定时代的文艺思潮与社会学术文化的内在联系，涉及文艺学与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史学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将文艺理论史的研究与文学史、艺术史和学术思想史有机结合起来。

每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都有其学术文化的思想背景。有一个时期，我们对研讨宋代文学思想与理学的关系比较感兴趣，教学相长，我写了《万物静观皆自得——儒家心学与诗学片论》等论著，兴祥则以理学家朱熹的文学思想研究为题作硕士学位论文，探讨朱熹的文论与其理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兴祥是一位尊师重道、一心向学的人，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下决心要读博。原打算让他读博阶段作“理学与南宋诗学”的学位论文，与他硕士阶段的研究有关联，应该比较容易入手一些。但是，另外一位同学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想做这方面的论文，与兴祥商量，结果如愿以偿。君子一诺，驷马难追，尽管兴祥是个厚道人，当时还是有点怅若所失。与我交谈后，他改作“北宋的经学与文学理论”的学位论文，这是一个比较难作的课题。

经学与理学都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两者是相通的，了解宋代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理学，也有助于理解这一时代的

“五经”之学。儒家五经里与文学关系紧密的,其实只有《诗经》、《春秋》和《周易》。兴祥的这本著作,以北宋的《诗经》学、《春秋》学和《易》学为当时学术文化的思想基础,探讨北宋经学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关系,在认真梳理历史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

首先,他从北宋疑《序》思潮的兴起和“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入手,考察北宋的《诗经》学与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关系,涉及诗歌鉴赏和诗体理论。在儒家经典里,《诗经》的性质是双重的,既是经部的著作,也是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宋人《诗经》学的特点是废序言诗,力求摆脱《毛传》、《郑笺》的束缚,提倡据文求义,采用以诗说《诗》的方法。这种阐释方法对北宋诗歌理论批评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为重视从作品的语句和意义的关系入手,解说诗的结构、章法、句法以及字法。这既是北宋诗歌理论家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他们重理性、重思辨的批评方式的集中体现。北宋《诗经》学里有关“六义”的解释,表明宋人对风、雅、颂之体制的重视,远远过于对赋、比、兴手法的兴趣,他们强调风、雅、颂诗各有体的意义,体现了宋人对辨别诗体的重视。这也影响到他们对诗歌体裁的看法,从而使北宋的诗体理论突破了前人重诗体功能论和诗体风格论的旧格。

其次,就《春秋》学而言,兴祥认为宋人继承了啖、赵、陆对《春秋》阐释方法的变革,以辨别三传得失的形式打破了汉代经学中的师法与家法的限制,走上了一条会通经传的阐释道路。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尊王”意识的高涨和“正统”观念的加强。从宋初古文家倡立道统,为文主张宗经,到范仲淹、欧阳修的学风建设,以及王安石“断烂朝报”之公案,都体现了《春秋》学对北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但《春秋》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宣扬微言

大义的“春秋笔法”上,尹洙的《五代春秋》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可以说是“春秋笔法”在“史法”上的具体实践;他们所作古文的“简而有法”,则是“春秋笔法”在古文“文法”上的体现。苏洵、苏轼和苏辙的《春秋》学,立足于对经、史关系的说明,与他们的古文写作实践相结合,形成一种融经史文章为一体的散文创作思想。

再就是解说《周易》的易学了。《周易》分经、传两个部分,兴祥认为《易传》对宋人思想的影响更大一些。他从宋人对《易传》所说的“观物取象”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理解出发,探讨北宋《易》学与宋人的文道观和艺术思维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宋人对“天地之道”与“性命之理”的论述,是“观物取象”说的进一步展开,体现了他们对“道”的理解。反映在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上,或是把文作为一种说理的工具,强调文章的实用性;或是重视“道充中实”的作家修养,以及“无意为文”的创作心态,揭示了文与道之间的体用、先后和内外关系。宋人从不同角度阐释《周易》的“寂感”说,使之具有“心性学”的内涵,其对北宋文艺创作理论的影响,表现为收视反听的心灵感通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在艺术构思中追求细致入微、合乎自然之数,强调要“造微入神”和“造理入神”,也表明宋人的内心通感是建立在精义入神的心性论基础之上的。

兴祥的这本著作由其六年前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书中的论说建立在细读大量一手文献的基础上,所以持之有据而言之成理,一如其人一样实在。谦卑而执著,羞涩而无畏,这是我欣赏的一种做人品格。但愿他今后不断努力,陆续有新的论著问世。

张 毅

记于“中国文学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

2010年7月8日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以诗说《诗》与诗歌阐释方法的变革	26
第一节 毛、郑辨妄和疑《序》之风与方法论	26
一、北宋《诗》学中的《毛》《郑》之辨及疑《序》 问题	27
二、以诗说《诗》中的方法论问题	35
第二节 据文求义与北宋诗学阐释方式的变革	39
一、据文求义的两种方式	40
二、主“文理”、“人情”与“意脉”的诗学批评原则	51
三、从“意新语工”到“意与言会”的诗学细读法	55
第二章 《诗》之“六义”与诗体理论	61
第一节 “六义”之说与诗之体用观	62
一、北宋的“六义”论	62
二、北宋的诗体理论	72
三、“因事激风”与“吟咏性情”	77
第二节 “风雅”之体与尚雅风气	85
一、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涵养性情之正	86
二、“风”之含蓄与诗之韵味	94
第三章 《春秋》学与宋代古文运动	101
第一节 北宋《春秋》学的阐释方法与尊王、正统观	101

一、北宋《春秋》学的阐释方法及其学术品格	102
二、“尊王”观念与“正统”之说	108
第二节 北宋《春秋》学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119
一、倡立道统与文主宗经	119
二、学风的建设与文风的转变	125
三、“断烂朝报”之公案及其时代意义	131
第四章 从“春秋笔法”到经史文章之学	139
第一节 尹洙、欧阳修的“春秋笔法”说与古文创作	140
一、尹洙古文的“简而有法”说	141
二、欧阳修经世致用的古文观念	149
第二节 三苏的经史之学与文章理论	156
一、苏洵的经、史之论	157
二、苏轼的《左传》学与古文创作	163
三、苏辙的《春秋》学与其古文理论	169
第五章 《易》传之“观物取象”说与北宋的文道观	177
第一节 “观物取象”与宋人儒道兼宗的处世心态	177
一、从天地之道到性命之理	179
二、“满目云山俱是乐”	188
三、“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196
第二节 “观物取象”对宋人文道观的影响	201
一、从“假象显义”到“寓理之具”	202
二、从“人文化成”到“文明以止”	214
三、从“道充中实”到“以气为主”	225
四、从“风行水上”到“无意为文”	232
第六章 《易》传之“寂感”说与宋人的艺术思维理论	242
第一节 “寂感”说的本质特征及其理论蕴含	242

一、“寂感”说的心学本质	243
二、“寂感”说的理论内涵	248
三、宋人对“寂感”的性情阐释	254
第二节 “寂感”说对宋人艺术思维理论的影响	267
一、“寂感”说与宋人的“墨戏”理论	269
二、“寂感”说与北宋文人画的题材与意境	273
三、从“造微入神”到“造理入神”的“入神”说	278
结 语	290
附录一：北宋《春秋》学著述补考	302
附录二：北宋《易》学著述补考	315
参考文献	324
后 记	334

引 论

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借助于皇权的支持,高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作为“经邦济世、从政立法的指南”^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亦无不受其影响,儒家的六经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独尊的经典。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等文学现象的理论分析、归纳和演绎,及其发生、发展,其理论形态、价值内涵的演变及定型,都深受经学的影响。^②

汉代是经学的“极盛”和“昌明”时期,经学对文学及文学思想、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经学发展到宋代,迎来了其发

① 吴雁南、秦学硕、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 页。

② 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说:“所谓经学,乃是在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的基础上加以文学的、艺术的要素,以规定天下国家或者各人的理想或目的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经学实在是中国的最大权威者,从其内容说来,可说是成为中国民族的哲学、宗教或政治、文学的基础的东西。”《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 2001 年版,第 2 页。

③ 对此,刘松来的《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对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有系统而深入的论述;程勇的《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齐鲁书社 2005 年版)也是一部研究汉代经学与文学理论的专门著作。

展史上的第二个辉煌时期,如皮锡瑞所言,宋代是经学史上的“变古时期”^①。所谓“变”,从经学的阐释方法而言,是由章句、训诂、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从思想内涵而言,是从外王之学向内圣之学的转变;从经学的传承而言,是由家法和师法向回归经典与自出新意的转变;从对待圣人和经典的态度方面来说,则是从征圣、宗经向疑古、惑经的转变。这种转变说明,经学在经历了魏晋及隋唐的低潮之后,再次进入到一个振兴发展的时期。北宋的洛学、关学、新学、蜀学等学派,无一不是以对经典的阐释作为其学术思想的根据。因此,尽管宋代学术界流派纷呈,但是经学的阐释学主题、经学阐释的方法以及经学阐释的思维方式体现出了一个时代的共性,能将这些学派整合在一起,从而能够在整体文化格局上体现宋代经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宋代的文学理论正是伴随着经学的这种新变而形成了自己的时代内涵和理论意识。

宋代王辟之在其《渑水燕谈录》卷六中以“文儒”指称宋代学者,包括欧阳修、尹洙、范仲淹、晏殊等一批文人,他们在学术上不重章句、训诂及考据^②,在文辞方面有独特成就和特色。这些“文儒”们大都有丰富的学术著作,如欧阳修著《诗本义》、《易童子问》,苏轼著《东坡易传》、《书传》和《论语解》,苏辙著《春秋集解》、《苏氏诗集解》、《论语拾遗》和《孟子解》,以及王安石著《三经新义》等。范仲淹虽然没有专门的经学著作传世,但是他的《易》学研究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这些“文儒”的出现,是宋代经

①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6页。

②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73页。

学“变古”的主体原因,因为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专业的经生、经师,而是文人与儒者的结合。从学术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兼重义理和辞章,从而使经学由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一变而为宋代的义理之学。“文”与“儒”的结合也就是“才”与“学”的统一,是性灵与学识的相互结合。从学识而言,宋人对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既敢于“疑古”、“惑经”,又敢于突破汉唐经学家法与师法的局限,自出机杼,这是宋人创造性及学识的一种体现;从性灵而言,宋人又能发掘经学中的内圣之意与心性之说,把经学中隐而未发的心性主题发挥到极致,使经学成为他们涵养性灵、提高学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士人的学识、学理,同时将经学与文学对举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宋代科举制的改革中。

二

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明经科,以贴经、墨义作为主要考试方式,考察士人对经典及注疏的记诵情况。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才在贴经之外“略试大义”,对经典的义理不甚重视。^①因此,唐代科举以诗赋而中进士者居多,明经诸科较少。自五代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时,以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中举者

① 马端临解释其原因:“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乎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涂。故其所取,反数倍于盛唐之时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〇,四库全书本)又云:“唐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而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见《文献通考》卷二九。

动辄数以百人计。宋初承五代之续,科举亦以诸科多于进士。^①对明经、诸科录取人数的增加是促成宋代经学兴盛与新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宋代经学的兴盛与新变,又和科举制内容的变革有直接联系。

宋代科举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考试内容的变革,与经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明经、诸科,而由章句注疏向通经明理的转变正是它们改革的方向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宋初八十余年(仁宗庆历以前),明经、诸科举士在考试内容上大体仍一遵注疏,尚未能出新意,^②又不重“经旨”、不重义理,但也还是出现了一些新变

① 宋太祖优待士人,乾德元年(963)即下诏书,曰:“一经皓首,十上千名,前史之明文,昔贤之苦节,悬科取士,固当优容。按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一依诸科举人,许令再应。”(《文献通考》卷三〇)。开宝六年(973),宋太祖殿试,取进士二十六人,而明经诸科中,《五经》四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人数远远超出进士科。(〔元〕脱脱:《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6页)马端临解释其原因云:“自唐以来贱其科,所以不通者殿举之罚特重,而一举不第者不可再应,盖以其区区记问犹不能通悉,则无所取材故也。艺祖许令再应,待士之意亦厚矣。”(《文献通考》卷三〇)《宋史》亦云:“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第3605页)另外,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取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但是其它诸科却有三百余人并赐及第。《文献通考》卷三〇云:“按是年诸道所发贡士得五千二百余人,赐第者共五百余人,为十取其一。”又见《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第3607页。

② 真宗景德二年(1005),李迪与贾边事正是当时经学风气的体现。《文献通考》记载,宋真宗景德二年,“亲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余人,特奏一百余人;诸科五百余人,诸科特奏七十余人。先是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文献通考》卷三〇)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亦是如此。《文献通考》卷三一记载: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上封事者言,经学未究经旨,乞于本科问策一道,对者纪绌。上以执经肄业,不善为文,特命取其所长,用广仕路,并不黜落。”

的苗头。如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在明经、诸科的改革中,除了保存墨义的方式外,还明确提出“能知义理”、“辨句”与“识字”的要求^①。识字断句,关乎经义;经之义理,亦为士人之学识与学理的体现,因此,这个要求的提出虽然还比较简单,但其对以后士人的治经方式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仁宗崇儒,“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因此在明经、诸科的贡举之中,对经之义理的重视也越来越突出。景祐年间(1034—1038),晏殊提出在明经、诸科考试终场加“试策一篇”,其目的是改变“诸科专记诵”的弊端。^②宝元中(1038—1040),范仲淹参知政事,宋祁等奏“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之状,提出“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的科举主张^③;知制诰王珪亦提出他的疑惑:“诸科既不问经义,又无策试,止以诵数精粗为中否,则其专固不达于理,安足以长民治事?”因此,他主张坚持“诸科终场问本经大义十道,《九经》、《五经》科止问义而不责记诵”的做法,这是针对当时“诸科杂问大义,侥幸之人,悉以为不便”^④的情况而提出来的。由此可见,贡举之中,考校经义,仍然尚存争议。但从早期的帖经、墨义为主,发展到须“识字”、“辨句”,以及“能识大义”的提出,再到此时“止问义而不责记诵”的主张,其间明经、诸科的发展趋势已是不言而喻,经典的义理也将成为科举中的重要内容。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旧制,三史、通礼,各试三十场,每场墨义十道。制自今只试墨义十五场,余十五场抽卷,令面读,能知义理、分辨其句、识难字者为合格,不合者落。”(《文献通考》卷三〇)

②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第3611页。

③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第3613页。

④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第3614页。

仁宗在庆历四年(1044)下诏,进一步明确,儒者应该是“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的博学之士,这一源于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界定对于科举及经学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说明治儒学,明经术,不能拘牵于声病章句之学,应以学为本,成为“学者之才”^①。因此,仁宗嘉祐二年(1057),在进士、诸科名额减半的情况下,反增“明经”一科,试法为“问大义十条”^②,在宋代科举中,首先明确了“问大义”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经学中重义理之风气的形成。

神宗钟意儒学,而经学的义理化倾向在科举制的引导之下获得了很大发展。如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一次关于贡举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提出了是否在贡举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的问题。这并非要把诗赋、明经以及诸科取消,而是主张打通各科之间的界限,试进士者不但熟谙诗赋,亦须通晓经义论策;反过来,明经、诸科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明经、墨义,粗解章句,亦需相当的文采,方能中格。^③从此次科举试法的改革始,形

①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58页。

② 《文献通考》卷三一记载:嘉祐二年的贡举“增设明经”,规定“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又见《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第3615页。

③ 如王安石主张:“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并规定“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文献通考》卷三一)。熙宁二年(1069)改革举制,提出“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第3618页。

成了神宗朝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的特点。然而因为过于强调经之义理的重要性,造成了“谈经者人人殊”的局面,神宗还特意颁王安石之《诗》、《书》、《周礼义》于学官,^①成为天下士子治经学的典范。王安石《三经新义》在科举制中的典范性在于:倡导“新”义,不依循旧说;发明义理,不寻章摘句,尤其是发明儒家经典与现实社会、政治等之间在义理上的密切联系,这既是王安石经学的特点,也是当时科举制所引导的士人治经的方向。

从仁宗庆历以来至神宗熙宁年间,科举制中对经义的重视已蔚然成风,引导并促成了士人对经典的理论思考,从而也引发了他们对前代经学的反思,直接促进了宋代疑经风气的形成与发展。司马光熙宁二年六月所上《论风俗札子》说:“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②北宋疑古惑经思潮的盛行,是当时思想界的一次大解放,是对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的突破,同时也表明,疑古惑经思潮的形成与科举制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仅有公卿大夫的“好为高奇”之论,尚不足以形成一种思潮,必待科举制的改革与引导,新近后生才有可能转相习尚,蔚为大观。

科举考试内容及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改变了士人专攻诗赋而不

^①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60页。

^② (宋)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六,丛书集成新编印十四卷正谊本,第153页。

重经学的偏见,使研读经典成为一时风潮^①;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士人治经的方式,不是把全部的精力放置于前人的注疏之上,而是追求对经义的自由发挥和创造性阐释,在开拓士人治学思维空间的同时,也从学理角度提出了改善士人治学背景和知识构成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深刻地体现了他们对经学与文学关系的新思考。

三

宋代科举制的变革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经学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时人对经学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在当时科举制的大讨论中,主要表现为对“诗赋”的罢黜与否、诗赋与经义、论策的先后问题的争论。

科举制中关于试诗赋还是罢诗赋的争论从唐代就已开始。进士科考试从唐高祖调露二年(680)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之时始加入经学,并以此作为考察士人之“学”的重要方式。^② 诗赋之试则始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③,以杨綰为首。但是诗赋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很大的争议性而进入科举之中的。如杨綰虽以“工文

① 统观宋代的经学著作,除了儒者专门的注疏之外,尚有为数不少的文士的文章,或以论、策的形式阐发某一条经旨,或以诗赋的形式诠释经典的意韵,这些也是宋代经学的重要内容,对治宋代经学者而言亦不容忽视。经学作品形式的多样化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士人对经学研究的重视。详见本书的《附录》。

② 《文献通考》卷三一,宋李淑奏文云:“唐调露二年(680),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以进士止试策,灭裂不尽其学,请帖经以观其学,试杂文以观其才,自此沿以为常。”

③ 《旧唐书》卷一一九云:“天宝十三年(754),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29页)